

林慎思的人性论及其教化意义

赵清文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今天的道德建设与传统道德教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理论进行挖掘,能够为当前的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从中国传统道德教化理论的哲学基础人性论入手,对唐朝末年著名思想家林慎思的教化观进行考察,分析他在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可能性、方法、途径等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可以揭示出他对于道德教化的本质和规律性的基本看法。

关键词:林慎思;人性;教化;道德

中图分类号:B24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8)02-0100-06

人性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讨论最热烈、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人性,是中国哲学中一个重大问题;历来讨论不休,派别亦极分歧。有许多学者,在别的哲学问题上并无贡献,而在人性论上颇有所见。可以说:人性的问题,得到了普遍的注意,且非关于人生的其他问题所能比”^[1]。人性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如此的关注,一方面,由于它是对“人”进行全面、科学认识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则因为它是道德教化、大政方略等重要实践问题的理论基础。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思想家在论述道德教化问题时,都是以人性论为哲学基础的。因此,人性论是理解中国传统道德教化思想的出发点之一。

对于中国古代的道德教化思想进行研究,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在于今天的道德建设同古代的道德教化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关联,中国古代提出的一些教化理论,在剔除了其中的糟粕和落后消极的东西以后,依然可以作为当前道德建设的有益指导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关于社会成员个体道德水平提高和社会整体道德风尚改善的经验教训和理论资源。无论是为了认识道

德建设的规律,还是为了探索卓有成效的道德建设途径和方法,挖掘和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道德教化理论,批判继承其中的合理因素,都仍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林慎思是唐朝末年的一位学者,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在人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自己对道德教化和社会治理等实践问题的基本看法。在以往教育思想史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中,林慎思的教化思想都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本文拟从林慎思的人性论入手,对其教化观进行一番考察,分析他在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可能性、方法和途径等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以期揭示出他对于道德教化的本质和规律性的基本看法。

一、“人之善恶,随化而迁”:道德教化的人性论基础

林慎思,唐朝末年福建长乐人。黄巢起义军攻战长安,时为长安万年县令的林慎思被执,大骂不止,被杀害。林慎思的著作,存世的有《续孟子》二卷和《伸蒙子》三卷。从上述著作来看,林慎思的思

收稿日期:2007-12-29

作者简介:赵清文(1973-),男,山东临沂人,副教授,哲学博士。

想虽然吸收、杂糅了法家和道家的一些观点,但在基本立场上仍然是和传统的儒家保持一致的,因此,《崇文总目》和《四库全书》等在分类时,都把林慎思的著作列入儒家。

林慎思生活的时代是曾经盛极一时大唐王朝已经完全走入颓势。朝廷上下耽于游宴,怠于政事,而百姓则饱受苛捐杂税、兵荒祸乱之苦。作为一名具有责任心的儒家知识分子,林慎思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运用儒家治国安邦之策止颓去弊,起衰救坏。同时,还要在朝廷尊佛抑儒的情况下摒除“异教”,光大儒家思想,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而要完成政治和文化上的这两大任务,在他看来,最为迫切和根本的就在于推行教化。

同前人一样,林慎思也把人性论作为阐发其教化思想的哲学基础之一,并以此为依据论述了教化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实施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性是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特性的哲学、伦理学概念。“人性”二字连用,大约始于战国时期。到了林慎思生活的时代,人性问题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深入。但是,对于人性问题探讨的深化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一种确定的或者能够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答案,而是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如果单从探讨的深度上来说,林慎思对于人性问题的思考并没有超越前人,但是与他的前辈们不同的是,他并没有象他们一样在人究竟是先天性善还是先天性恶上纠缠不休,而是将目光转移到一个更加具有实践意义的角度,着重分析了人性中是否具有使人的善恶“随化而迁”的先天资质,即能不能从人性中找到通过后天的教化而使人的善恶品性得到改变的可能的的问题。

先秦之后,绝大部分思想家都把善恶作为人性最根本的规定性,并且无论是性善论者还是性恶论者,大多认为人性善恶本身不可改变。孟子所说的“扩而充之”、“求则得之”^[2],也仅仅是指通过“求”、通过“扩”,把人性中善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而人性本身所具有的那些善“端”、“良知”、“良能”,则不可能也不需要改变。主张性恶的荀子更是主张人性“不可学,不可事”^[3],人所能做的仅仅是通过自身的改造用礼义之“伪”克服人性之恶。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思想家,无论是主张“生之谓性”,还是认为人性来自于“天”、“理”、“道”、“自然”,其实都与这样一种认识相联系:人所能做的并不是改变天赋的善恶本性,而是或者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自己的活动不断向人性中所本有的善的要求靠近,

将其作为自己活动的指引和准则;或者通过寡欲、克制和自我约束等方法来抵制人性中所本有的恶,从而使个体行为符合社会要求。正如董仲舒所说:“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4]。

汉代以后,随着人性理论以及教化、修养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渐渐开始考虑人性善恶是否可以变化的问题。东汉的王充曾经说:“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5]。然而,王充在谈论人性的变化时是极为谨慎的,他所谓的变化实际上仍然是人后天品质的变化,而并非人的先天本性本身。所以他接着又解释道:“圣主之民如彼,恶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5]。他所说的“恶变为善”,其实仍然是孟子所说的对善端的扩充或者荀子主张的以后天之“伪”来克服先天之“恶”,并非人性善恶本身的变化,更没有涉及到人性中是否具有使善恶得以变化的先天资质问题。

林慎思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基本认识是:所谓人性,就是人先天所具有的材质或性情,是人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内在依据和可能性。在他看来,善恶的属性并不是人性中的最根本的规定性,善恶是通过后天的教化和习染而来,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善恶是后天获得的品性,其本身并不是人的本性中先天具有的。人的本性中所具有的只是能否引其向善的资质,这种资质就像物体能否通过疏导使其流动一样,比如水的性质决定了它可以通过引导而改变位置,而土则无法通过疏导使其流动。在此认识前提下,林慎思认为,对于人性可以作如下三个方面的具体理解。

第一,人性的最本质的规定性不是善与恶,而是刚与柔。人的先天本性有刚有柔,但是刚柔是人通过接受外力的作用和通过主观努力改变自身善恶的可能性,并不代表善恶本身,善恶只是后天教化和熏陶的结果。“善不在柔,恶不在刚也。……人之善恶,随化而迁也,必能反善为恶,反恶为善矣”^[6]。在林慎思看来,人性刚与柔的差别就像火与水的区别一样,水与火虽然不能相互转化,但它们都既具有可以造福于人的一面,又具有可以给人带来灾难的一面。刚柔也是一样,刚与柔的本性尽管是不可改变的,但它们都可以在使人向善或者从恶的可能和程度中表现出来。

第二,林慎思承认善恶可以“随化而迁”,但是由于人先天所具有的刚柔材质不同,一个人究竟能

二、礼乐熏陶、开化民智： 道德教化的根本途径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很少有单纯为理论而理论的现象,无论讨论多么抽象的问题,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社会实践。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也是一样。他们虽然在人性问题上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然而不论持何种人性主张,其最终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即为道德教化和社会治理提供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无论是持性善论、性恶论的思想家还是持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思想家,他们虽然绝大多数认为人性的善恶属性是确定不移的,但他们都没有把人的先天善恶状态同个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道德素质等同起来;无论是认为人性中有为善的潜质、有为恶的可能,还是坚持人性本身如同白纸一张,先天无所谓善恶,他们都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善恶都是后天教化、修行和习染的结果。因此,虽然不同的思想家在人性善恶问题上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但在一点上它们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即良好的个人道德素质和社会道德风尚源于教化,教化的直接目的无论是对人先天本有的善性加以扩充,还是对人性中恶的因素加以抑制,或者一方面养成善的习惯;一方面抵制恶的影响,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通过教育、引导和熏陶,使人接受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从而造就出道德高尚的人来。

林慎思从刚与柔的角度对人性进行的探讨,其着眼点正在于道德教化。他所提出的善恶“随化而迁”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肯定了通过教化来改变人的善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既然人性之不同皆是出于自然,而善恶又是“随化而迁”的,因此必须而且能够通过教化引导人由恶的方面向善的方面转化,同时阻止善的方面向恶的方面褪变。于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他提出了施行教化的切实方法和现实途径。

在教化的具体方法上,传统的礼乐教育仍为他所看重。林慎思认为,除了极少数冥顽不灵的人之外,绝大部分人的人性都是可以引导其向善的方向发展的,因此,儒家传统的礼乐教化作为一种能深入人的心灵,通过感化人、熏陶人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品质的方法,应当作为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面对晚唐时期儒学衰微、社会动荡、风俗败坏的现实,他曾经慨叹:“……执雅乐之器者,王虽未弃,王终不能用矣”^[7],表达了他对当时的统治阶层废弃儒家

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教化而成为有道德的人,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一个人的本质柔而易化,那么就很容易引其向善;而如果一个人的本质刚直倔犟,一旦为恶则将很难改变。他以太甲和桀、纣相比较分析说:“太甲不肖,犹良马也,伊尹则可维繫以迁于善也;桀、纣不肖,犹猛虎也,龙逢、比干岂可囚拘以迁于善乎?”^[6]有些人的恶就象良马偶尔会伤人,有些人的恶则如同猛虎会吃人,马之性与虎之性是不同的,马性中的恶可以通过骑士的驯化而去除,使其善性得以发挥出来,而这对于虎来说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社会中总会有一些人“昼观刑戮于市,暮行诛劫于衢”^[6]。

第三,就个体来说,人的刚柔资质是先天完具、无法改变的,但从社会历史发展总体上说,与人的善恶是否可以“随化而迁”相联系的刚柔资质本身不是万古不易的,而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林慎思认为,就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人类文明越进步,人们就越容易教化,人接受教化的程度取决于民性的“朴”与“诈”。林慎思所谓的“朴”,就是事物未经加工的自然原始状态,体现在人类社会中,指人类未经开化的蒙昧状态;所谓的“诈”,就是指社会成员经过文明的浸染之后所表现出的智力提高、思维活跃的状态。在林慎思看来,虽然“古民性朴,今民性诈”,但是今人相对来说是更容易教化的,这是因为“吾所谓古民难化,性犹土也。土不移,移则硃堋生矣。今民易化,性犹水也。水可导,导则其源清矣”^[6]。“朴,止也;诈,流也。止犹土也;流犹水也。水可决使东西乎?土可决使东西乎?”^[6]人类具有文化继承性的特征,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所积累的不仅是经验和知识,本身的思维、判断等能力也不断得到加强。人类自身素质的提高,使其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化的引导,从而在其属性上日益表现出由刚性向柔性转化的特征。

总之,在人性问题上,林慎思独辟蹊径,一反前人从善恶角度分析人性的传统,在承认善恶不是人先天具有的根本属性的同时,把问题的重点转移到人性的刚与柔,即人性中是否具有可以改变的因素上,从而为教化等社会实践问题提供了更直接的理论依据。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林慎思对人性问题的分析还是很粗糙的,其中有些内容仅仅来自于直观的印象和主观的推测,没有经过深入推敲,因此难免存在着一些相互矛盾之处。

的礼乐教化和传统仁义道德观念的不满和深深的忧虑。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林慎思主张,想要达到移风易俗、使民向善的目的,就要从最高统治者做起,自上而下地推行礼乐制度。他借孟子的故事阐发说,孟子谒见梁襄王,梁襄王“仪服不整而见孟子”,孟子劝诫他说:“《诗》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王每见轲若此,何以则民乎?”如果一个统治者想以“恩信来其民,必先以容仪正其身”,否则,“不遑以容仪为务。使上下无仪矣。君臣父子何以则乎?”^[7]这里,林慎思表达的就是应当自上而下地将礼仪作为稳定社会秩序、化美社会风俗的基本手段的主张。

然而林慎思也看到,礼乐对人的约束和感化,与人本能的自然需求并不是一致的,有时甚至相违背。“可敬者,礼节也,礼则难行,故人不能嗜矣。可去者,非礼也,非礼易惑,故人不能舍矣。是以演先王之教,不得人之乐者,教难行也;吐倡优之辞,皆得人之喜者,辞易惑也”^[6]。因此,在林慎思看来,为了醇化民风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教化必须成为一项长远和普遍的社会任务。它不仅仅是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来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认识,而是应当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和资源,将教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他的人性总体上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思想为基础,林慎思明确提出了对民众施行教化首先要开化民智的主张。他反对愚民政策,认为民智的开发与他们道德水平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要化民首先必须使民“有知”。在林慎思看来,“人无不惑”,没有一个人生来是全知全能的,关键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惑”“知”与“不知”的问题。“君子知其所惑,而不惑矣;小人不知其所惑,而惑矣”。人们只有知道了自己之“惑”,才能主动改进,加强修养,自觉抵制各种不良倾向,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历史上桀纣幽厉、臣民士庶的亡家丧身,都是因为“不知其所惑矣,而惑遂至丧亡焉”。因此,“设使君如尧、舜,臣如夷、齐,士如颜、闵,前设糟邱、酒池之乐,后陈鹿台、铜山之货,左右列姐己、褒姒之容,安能乱尧、舜之德,污夷、齐之风,染颜、闵之行,而至丧亡乎?”^[6]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林慎思认为,对“有知”的人和“未有知”的人施以教化,前者要容易得多。就“古民”和“今人”来说,“古民性朴,今民性诈”,“性朴”是人“未有知”的表现,而“性诈”则表明了人已“有知”,因此,对于“今人”施以教化要比教化“古民”更能够取得实效。他以对儿童的教育

做比喻解释说:“婴儿未有知也,性无朴乎? 卯儿已有知也,性无诈乎? 圣人养天下之民,犹养儿也。则古民婴然未有知也,今民卯然已有知也。化已有知,孰与化未有知之难乎?”^[6]林慎思的这一思想,一反封建社会中长期盛行的愚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三、恩威并济、以刑辅德： 道德教化的强化手段

林慎思承认,人先天材质的刚柔是不同的,一个人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教化将其引入到既定的社会秩序和统治者希望的统治秩序之中,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在林慎思看来,教化是维护社会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这一认识,又为他的礼法并行、德刑并用、教化与强制相统一的治理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法律和道德都是调整人 and 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形成社会风气都有重要作用。任何一个社会的治安的稳定,既要靠法律制裁也要靠道德教育。同样,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的形成,不但要靠道德教育,而且也有赖于法制建设”^[8]。林慎思认识到,刑罚既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力武器,又是提高教化效果的主要手段。为了增强道德教化的效果,早日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往往需要一定的强制手段来辅助教化的推行,用他律来强化自律。在当时动荡混乱的社会形势下,他看到,单凭教育本身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礼乐教化的方法并非对所有人都能奏效。“狸能捕鼠,不能捕狗”^[6]，“日月之照,孰曰偏邪? 而瞽者不被日月矣;雷霆之震,孰曰隐邪? 而聩者不戴雷霆矣。圣人以恩信临人,岂得昧于天下乎? 盖习叛者瞽于恩信也”^[6]。因此,在强调礼乐教化的同时,林慎思主张,当教育熏陶的方法不能有效引导某些社会成员个体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社会风气不能有效得到改善的时候,就必须以刑罚的方式进行惩治和规束。明智的统治者只有充分使用刑罚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才能使人人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的要求,从而免受国家的制裁和惩罚,安居乐业;否则,刑罚废弛,老百姓不知所从,这其实是对人民的残害。这就是他提出的“有道之君刑峻”的理论。他用水火和虎狼做比喻论证说:“水火不暴于虎狼也? 然水火之为峻也,必能滔涌天地,

焚燎山川,而人不蹈也。狼虎之为峻也,止于呀风吼雾,噬兽啖人矣,岂及水火之大欤?所以水火仁于人,而人赖之,不见其峻也;狼虎害于人,而人畏之,故见其峻也。有道之君犹水火然,无道之君犹狼虎然。狼虎不及水火之大,岂不明乎?”^[6]

林慎思不但认为刑罚对于维护一个社会的稳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甚至认为,对于治理社会、稳定秩序、化美风俗来说,“刑”是比“恩”更有效的手段。他论证说,当用“恩”来治理人民的时候,正是老百姓都能够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谨守为民之道的时候,而当用“刑”来矫正社会秩序的时候,则说明老百姓已经违背了社会规范,有了违法和僭逆的举动。如果老百姓谨守为民之道,统治者无须采取什么措施,就能使社会有序、稳定,所以并不需要“恩”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多大作用;而如果老百姓违礼僭越,则只有通过刑罚的手段,才能矫正社会秩序,所以“刑”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效果明显。“民既民,恩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谁御哉?譬处家而治群下焉,下之良者,虽恩赏不至,且未失于良矣;下之恶者,苟刑责不及,孰可制其恶哉?是知治民用刑为最”^[6]。林慎思的这一思想同“有道之君刑峻”的理论一样,都是对儒家传统“德刑观”的明显跨越,究其原因,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道德堕落、社会动荡、民变蜂起的社会现实不无关系。

孔子曾经强调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9],但在传统儒家那里,一直都是认为德治、惠政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优于刑罚。从这一点上说,林慎思在“德刑观”上与传统儒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然而,在教化、刑罚应与仁政相结合这一点上,林慎思却与前人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在当时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林慎思深深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疾苦,呼吁统治者要设身处地地为劳动者着想。尽管如此,林慎思从改变社会成员的品行和品质出发,反对一味用赈济的方法使老百姓不劳而获,而是主张应当采用发展生产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并避免使他们养成浮华怠惰的习惯。在《续孟子》中,他借孟子之口,对“民未及歉,则开廩以赈之,不使民歉也;民未及寒,则散帛以给之,不使民寒也”的所谓“抚”民措施进行了批评。他讲了一个“鲁民教子取薪”的故事。鲁国有一个人让儿子去采薪,临行前问儿子:“百里之外的南山上有薪,百步之外自家的园子里也有薪。你想到山上采薪呢?还是想到园子里采?”儿子回答:“园子近,当然愿意到园子里采”。鲁国人说,这种想法不对,“近是我

家之薪,远是天下之薪也。我家之薪,人不敢采之,以天下之薪尽,则我家之薪存焉。天下之薪,汝胡不先采之?以我家之薪尽,则天下之薪何有哉?”林慎思转而说,抚民和取薪一样,都应当有长远眼光。“民有耕织,犹南山有薪,不待取其耕织而赈之给之,是知鲁民教子乎?以恩乐于民,不知民乐为情,民情则何取乎?”^[7]林慎思的这种从长远出发,把解决老百姓的物质生活需要与培养他们的勤劳自强品质结合起来,以寻求长治久安之路的思路,应当说是具有一定见地的。

四、结 语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道德的进步,如果以牺牲道德为代价来追求物质产品的丰富,这种“发展”是丝毫不值得称许和期待的。目前,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已经基本得到认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采用科学的方法,使道德建设显现出成效。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有关道德教化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地发掘、整理,继承、借鉴,不但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个缺憾,对于现实的道德建设也将是一个损失。正如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因此,对于包括林慎思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道德教化思想,我们必须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总结其中的基本规律,用以指导今天道德建设的实践。这是提高道德建设的有效性的一条可行途径。

参考文献:

- [1] 张岱年. 中国哲学史大纲[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 [2]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3] 高长山. 荀子译注[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 [4] 阎 丽. 春秋繁露译注[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 [5] 黄 晖. 论衡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6] 林慎思. 伸蒙子[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7] 林慎思. 续孟子[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8] 罗国杰. 罗国杰文集:下卷[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 [9] 洪亮吉. 春秋左传训诂[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Theory of human nature of Lin Shen-si and its value for moral education

ZHAO Qing-we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moral construction links closely with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can provide beneficial instruction for the current mor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from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philosophy foundation of the theori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observes the the theories of moral education of Lin Shen-si, who lived at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analyzes his main standpoint about the necessity, possibility, method, path of morals education, and finds his basic viewpoint on the essence and regul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Lin Shen-si; human nature; education; moral

(上接第 81 页)

人民出版社,1985.

[27] 吴易风.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M]. 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5.

Ideology, informal institution changes and interpretation for “Shaanxi phenomena”

CAI Li-xiong^{1,2}

(1. Center for Study of China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2. School of Article and Education,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364012, Fujian,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aanxi,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method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institutional reasons of “Shaanxi phenomena”.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Shaanxi phenomena” lies in the existing ideology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 that go behind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acks enough motivation and adaptabl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these, the resources cannot be fully optimized and utilized and the economic growing speed falls far behind its potential growth ratio. Therefore, a necessary way to change “Shaanxi phenomenon” is to reform the old ideology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sent good conditions in the nation-wide economic reforms should be made full use of, introspection and educ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promoting its changes and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public opinions should be promoted in leading its changes so that its healthful development can be fulfilled in the change.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haanxi phenomenon; ideology; informal institution